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建立新的大数据服务体系

李铁

前沿观察

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对传播风险的严格防范。由于人口流动规模大，范围广，如何追踪潜在病毒传播人群，掌握更为准确的信息，对于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严峻的考验。

面对未来的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卫生安全，必须更多依赖新技术和新信息源

这次疫情迅速传播带来的压力提醒我们，面对未来的城市社会治理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要更多依赖新技术和新信息源，才能最终达到服务于全社会以及所有城乡居民的效果。

那么，什么是新的信息源和数据源？其实就是以互联网、移动数据以及手机信令的空间位置信息为基础，以所有个体用户为主体形成的信息源和数据源。

简单来说，每个成年人，包括部分少年儿童，都离不开手机和网络。手机的空间定位信息是自动生成的，而网络消费中的各种定位也是经过个人授权后被网络运营商所采用的。这些基于每个人的手机信令和网络数据的信息源，同时也就构成了所谓覆盖最广的数据源。所谓大数据，不仅包含传统的上报信息，更多的是覆盖全社会的以互联网和手机信令为基础的数据源。

在信息源和数据源中，谁的覆盖面广，数据源多，谁的社会消费影响力就大，未来可开发的数据潜力也越突出。

通过手机信令的大数据系统，可以完成真正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

据统计，目前网络信息源占有优势的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几家大的互联网企业，2019年腾讯微信月活跃用户9.91亿；阿里巴巴移动端月活跃用户达7.85亿，支付宝月活跃用户超过6.5亿；百度APP月活跃用户3.16亿；京东活跃购买用户3.34亿；此外，抖音月活跃用户达到了6.5亿。而手机信息源占有优势的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它们的手机用户分别达到9.47亿、3.21亿和3.34亿，分占全国手机用户的59.2%、20%和20.8%。

网络信息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相比，在日常应用过程中显然是网络用户占有优势。单就一个互联网企业，如腾讯或阿里巴巴的信息用户，就可以达到与中国移动用户相当的规模，而且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但从全覆盖角度看，特别是在这次疫情传播中对于潜在感染者的追踪，显然网络数据的覆盖能力相比之下弱于手机用户的覆盖能力。因为对于网络用户来说，一个手机可以同时提供许多个网络服务的定位，但是所有网络服务都离不开手机。也就是说，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巴巴，即使各自用户都覆盖了中国60%-70%的人口，但是仅此而已。两者即使相加，总用户还是这么多，所以空间定位无法做到全覆盖。对于手机用户来说，虽然总的手机用户可以达到16亿多，超出了中国的总人口。但是三大运营商的手机用户是无法重叠的，即使有一人多机现象，也很难改变用户的总规模。可以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手机用户加总，基本可以覆盖全国所有用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手机用户相比于互联网用户更可以做到全覆盖。

从生活实际中也可以看到，除了少儿之外，几乎所有成年人都离不开手机。因为手机信令可以做到空间和人口全覆盖，通过手机信令的大数据系统，对人口空间移动进行全方位追踪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把三大手机运营商的信令数据统筹使用，我们就可能完成真正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

通过手机信令提供最准确有效的数据源，可以减少社会成本，实现有效精准的疫情防控

手机信令的追踪能力可以做到对任何一个持有人，一天24小时的持续定位。我们不仅可以对个人的行动轨迹进行跟踪，而且可以对城市的人群进行数据化的分析。

例如，一个城市在过去半年内有多少人口，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本地的，通过手机号码的实名认证，就可以得出结果。在半年的数据保存时间内，可以对人口的流向，空间位置的聚集，做出准确的分析。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从手机信令入手，只需把三大运营商的数据拿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疫情涉及到的人群规模和具体的人员情况。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这些手机用户的空间变动情况，只要把这些外地和本地外出人员的手机号，特别是期间的流动信息，通过疫情重点城市分别上报三大手机运营商并发往各地公司，各地就可以根据这些手机信令数据来随时监测这些疫区外出人员的行踪。

要做到这些，既需要三大手机运营商动员全国基层公司，提供准确数据源，也需要相关的公司进行大数据模型运算，建立规模人群的追踪监测系统。这样就可以清楚地得到最终的人员流向和发现疫情传播的轨迹，为全国各地的疫情防范提供最准确有效的数据源。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轻各地政府的压力，减少社会成本，实现有效精准的疫情防控。在动员三大手机运营商的基础上，也可以通过各级政府，要求各地网络运营商提供网络信息数据，对手机信令数据源进行补充。这样可以强化数据的监测能力，防止遗漏。

当然，对于手机运营商和网络运营商来说，会加大工作量和投入。但是政府的防疫总动员，可以提供专项投入予以支持。各个企业也可以把对疫区的支持体现在数据源的支持上。

新的数据服务体系转向针对全社会的服务，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性危机

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次疫情灾害，重新建立起面向全社会的数据服务体系，改革传统的数据搜集方法，建立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中心，以用户数据源为基础的真正的大数据系统。把政府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平台融合，从只针对政府的服务，转向针对全社会的服务，可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性危机。

对于手机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来说，通过整合数据源，真正地放大了数据利用渠道，从企业自身的需要和满足社会责任的需要，使得长期被沉淀甚至浪费的数据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在数据全覆盖的过程中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和社会服务机会。

一些有能力提供数据服务的企业，则可以利用这次数据整合进行深入研发，建立新型的社会公众服务和商业服务的数据信息平台。

在疫情防控中，中央政府可有效利用手机和网络数据源，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企业的数据储存库建设。各个手机运营商和网络运营商，因为数据储存会占用资金和资源，大多都在半年或最多两年内删除过往数据。如果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建立数据储备库，对于手机运营商和网络运营商长期闲置和浪费的数据资源，应该是一次最好的再生和无限利用机会，可以为国家和城市以及各类企业进行更为广泛的服务。

经过这次疫情防控，一些互联网大数据企业可以成立新的公司，利用新的数据源展开商业和社会服务，政府也可以把数据服务交给市场，形成新的数据源管理方式，提高应对城市和社会治理，以及各种突发性危机的效率，并降低成本。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襟怀一抹善待之念

——从禁食野生动物看全民生态意识觉醒

张月昕

热点思考

2020年新年前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禁止捕杀、拒绝食用野生动物”一时成为了社会公众的热门话题。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在禁食野味、拒绝“舌尖上的任性”的社会舆论下，全民生态意识正在悄然觉醒。对此，我们应抓住有利时机，乘势而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的要求，大力提高公民生态意识，培育公民生态素养，推动形成全社会生态自觉。

提升爱护自然的生态意识，秉持一颗珍爱之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从反面给全民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教育课，它促使人们深深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爱的世界里，我们不仅要关爱他人，还要拥有一颗珍惜自然、珍爱动物之心。大自然需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呵护。疫情警醒人们，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身，珍惜自然这个人类无机身体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的有机身体。不论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始终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也始终在人之中，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一旦人类撕裂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化和冲突化，其结果将严重危害人类自身。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对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施之以爱、导之以行，千般呵护，万般珍视，时刻勿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提升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襟怀一抹善待之念。过去一段时间，少数人味蕾满足的背后，是无数野生动物的痛苦呐喊！实际上，疫情的发生就源于我们人类自己。人类自以为强大，肆意捕杀野生动物，从而导致大量野生动物灭绝，珍稀动物越来越少，这将让更多的人处在危险之中。看到疫情带给人类的痛苦和不安，全国乃至全球的人们都在呼吁，爱护和善待野生动物，与动物们和平相处，不要再侵犯，不要再杀戮。人们应当懂得，珍惜动物，拒绝野味，是人类血与命的教训，也是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的基石。人不可妄自尊大，不可凌驾于自然之上，也不可随意捕杀、食用作为人类朋友的动物。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有所戒惧、有所约束，既是我们自我防护的需要，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应当成为全民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否则，如若好了伤疤忘了疼，“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就难免再次上演。痛定思痛，我们应自觉树立敬畏生命、善待动物的生态意识，始终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生态施以善的态度和善的举动，善待自然，远离野味，给野生动物一线生机，给自然生态一片绿色，给人类社会一份安宁。

提升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恪尽一份守护之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保护自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求提供资源，而应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提供保障。人的现实的欲求很多是人的虚假的需要，最终将导致人的自我否定。而人本质的需要，也就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才是人的真正需要。当人类以此为出发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其所担负的保护自然之责也就有了坚实基础，成为了人们自觉的生态行动。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发展的今天，人类的生态文明也应与时俱进。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就是保护人类不断发展的未来。这既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素养，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份责任。现在，人类实在经不起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经不起对野生动物的劫难。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长久生存乃至永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大雨可以延迟我们到达的时间，但不能阻止我们前进。我们应以这场疫情风雨为契机，开启全民生态意识的觉醒，实现全民生态自觉，做到爱护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用珍爱之心去善待之念，用善待之念行恪尽之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筑牢绿色基石。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80后90后有着果敢和牺牲精神——

中国战“疫”中的人性之光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域外视角

在过去的25年中，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我看到，由于党的政策及其优秀干部和人才，人民的勤劳奋斗，中国人民从一贫如洗到富裕做实。

我非常关注新一代中国人的行为变化，特别是“80后”“90后”的时尚生活方式。我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地铁上的年轻人用的是华为、苹果这些价值不菲的手机，他们中的许多人头发染得五颜六色，背着名牌包，穿着高端运动鞋。与伦敦地铁上的同龄人相比，我发现中国年轻人更富有、生活更奢华。我常常感慨他们与父辈的代沟。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他们坚韧的父辈和祖辈做出了伟大牺牲。我常常想起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常说的词语——“小皇帝”。

当前，中国面对着可怕的病魔。当国家和人民面临巨大的挑战时，这些娇生惯养的“小皇帝”们毫不迟疑地投入战斗，中国领导人和伟大的党也没有让同胞失望。成千上万正处花样年华的年轻人，脱去靓丽的衣服，扔下昂贵的皮包，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疫大军，为人民战“疫”。这不仅是中国的战役，也是全人类的战役。“小皇帝”一代，全身投入到战役中，不仅为了中国，也为了全世界。中国青年一代有着果敢和牺牲精神，为保卫人民免受病毒侵扰，已有1700多位医生及医务工作者不幸感染病毒，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很年轻。

父辈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场“战疫”中，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医院和重症监护室，奋战在病毒研究实验室里，驻守城市大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这些年轻人不是什么“小皇帝”，他们像中世纪的骑士，在伟大的万里长城上捍卫中国。

此次战“疫”中，中国女性引起了我的关注。她们是中国的女骑士，是中国的新“女王”。女性医生、护士、医务工作者和专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与兄弟、同事、爱人共同奔赴前线。她们换下靓丽的衣服和皮包，舍弃了用心呵护的长发，奔赴前线。这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更展现出决心和勇气。中世纪的女骑士们和她们一样，战前几个小时，剪掉自己的辫子，显示她们的战斗决心。她们在战“疫”中相互鼓励，传递希望。她们冷静地照顾病人，没有恐慌。在疫情的黑暗中，她们用歌舞消除恐惧，寄予病人以希望，在与死神赛跑中，搭建生命之桥。

正值青春的女医生、女护士、女清洁工们付出的牺牲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女性在此次大考中，奉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穿着白大褂的她们就像是中世纪的女骑士，坚忍、勇敢、高贵……她们柔软的心因对这片供给她们生活富足、充实愉快的土地的热爱而跳动，是她们守卫着武汉，用自己的技能，才干，消灭疫狂的敌人！

武汉的王晓玲以及那些坚守武汉的中国女性们，传承了中国女性的勇敢、坚忍和奉献精神。她们继承了那些在危难时刻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遗志。赵一曼（1905-1936）领导游击战反抗日本侵略，像神话中的骑士那样微微起死。“小皇帝”一代已经成长为坚强的战士，投入战役，加入人民抗疫队伍。有的不幸染病的医护人员，在弥留之际，仍舍着眼泪，坚信胜利。这一代“小皇帝”在悲战最终取胜时，一定会给后代留下许多英雄事迹，许多乐于奉献以及品德高尚的感人故事。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际荣誉顾问，译者王炳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阿拉伯语系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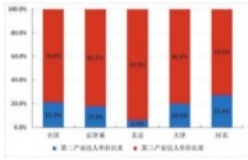
“迁得出去、落得下来”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企业疏解提升尚有难题待破解

赵莉

北京策论

为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已有配套政策的成效进行总结、跟进分析现有政策的缺口、探讨进一步的完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近三年主要配套政策及成效

三年来，为确保非首都功能产业疏解“迁得出去、落得下来”，北京市联合津冀两地陆续出台了系列配套政策：一是在严控增量、调整存量、优化发展方面，完善产业目录，提高产业疏解提升的精准度。二是完善腾退土地再利用政策，回应企业的核心关切。三是完善资金奖励政策，降低企业迁移成本。四是完善公共服务政策，缓解企业后顾之忧。

随着配套政策的不断完善，调整疏解的步伐大大加快。据统计，截至2019年11月，北京市已累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3047家，疏解提升计划内市场630个，疏解关停物流中心122个；与2013年末相比，北京法人单位在津冀的产业活动单位数量增长225.9%，分别比天津和河北高108.9个和170.6个百分点，说明北京对津冀地区溢出效应明显。公共服务方面，与津冀开展教育帮扶项目60多项，签署基础教育合作协议10多项，成立了北京市职业教育专家顾问团，帮助河北职教院校提升办学水平；已有30多家北京市属医院与河北几十家医院共同开展合作项目；等等。

尚未破解的难题与诉求

由于配套政策涉及领域广、层级多，此轮疏解提升又具有意义大、力度大、范围广、距离远、时间紧、成本高的特点，三年的时间尚难以完全满足疏解企业的需求。调研中企业反映较多且需求迫切的困难与诉求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腾退土地的再利用政策存在缺口。调研企业普遍反映，一是老工业区腾退空间的再利用存在同质化现象。北京市已出台的文件对老工业区发展“高精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科技服务业等有优惠政策，许多国企在缺乏高端制造技术的情况下，纷纷投向文化创意产业。二是过渡期政策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国家和北京市出台的针对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开发区转型升级等企业腾退土地利用指导意见中都提出了5年过渡期政策，企业认为5年时间对于多数投资来说都比较短，不利于长期投资，制约了有些产业的发展。

三地间企业资质认证的对接机制不畅。产品疏解过程中，原生产制造厂的产品认证和体系认证都将失效，需要在新的制造地取得认证，否则就不可以在当地生产。目前，京津冀三地对于企业资质和认证的对接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起来，即从北京搬迁到天津、河北的企业，几乎所有资质许可甚至ISO系列认证都需要在迁入地重新申请，且审批周期较长，严重影响企业的落地和运行。

三地间税收分享机制尚未理顺。2015年国务院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如今，这些规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对迁出企业2000万元的纳税额要求过高，符合条件的企业寥寥无几，至2019年没有一家企业能享受此优惠政策；二是该办法提到的“三税”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近两年全面实施“营改增”后，内容没有及时调整，并且分享比例没有区分不同税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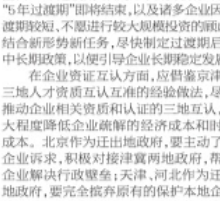
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的建议

在腾退土地的再利用方面，一是拓宽再利用的业态范围，在符合北京总体规划和相关区域详细规划的前提下，创新规划土地使用分类，除了鼓励发展文创产业和科技服务业外，适当提升工业用地兼容性，向优先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方向倾斜。二是出台“5年过渡期”后的中长期政策。针对“5年过渡期”即将结束，以及诸多企业因过渡期较短、不愿进行较大规模投资的顾虑，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尽快制定过渡期后的中长期政策，以便引导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在企业资证互认方面，应借鉴京津冀三地人才资质互认互准的经验做法，尽快推动企业相关资质和认证的三地互认，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疏解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北京作为迁出地政府，要主动了解企业诉求，积极对接津冀两地政府，帮助企业解决行政壁垒；天津、河北作为迁入地政府，要完全摒弃原有的保护本地企业的思维，对北京迁入企业已享有的国家认定的相关资质和认证给予直接认定。

在三地间产值和税收分享方面，加强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建立可预期的跨行政区利益分配制度。针对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税收分享问题，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进行修订完善。一是调整各方利益分享比例，将个人所得税替代营业税，并且区分不同税种的各自分享比例。二是制定多层次的分享准入标准。执行不同的分享标准，使中央政策真正发挥出对协同发展的推进作用。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首都高端智库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



供图 季礼

学习与答疑

责编 / 张沁雪 版式 / 郭牛牛 Email:zhangqinxue@gmd.com.cn 电话:86202867